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丛书

# 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主 编：梁 木

副主编：曾庆榴

广东人民出版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丛书

# 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主 编：梁 木

副主编：曾庆榴

广东人民出版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丛书

# 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梁木 主编

曾庆榴 副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75印张 3插页 115000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60册

ISBN 7—218—00546—2/D·69

定价2.10元

## 出 版 说 明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丛书共四本，由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等单位承担撰写。《人类历史的新航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由张幼峰、刘嵘主编；《人民群众的护身法宝——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由黄家驹、侯经体主编；《历史与人民的选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梁木主编；《人类历史新纪元的航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由张江明、梁渭雄主编。

这套丛书比较系统地阐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内容、观点、理论原则、历史发展，以及如何成为立国之本，对国家民族前途起着决定性作用。它的出版发行，有助于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助于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由于时间匆促，会有不少不足之处。恳切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关心、支持和批评指正。

1990年1月31日

#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严峻的挑战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党面临的考验	5
三、不容动摇的根本原则	13
第二章 党成为执政党的历史必然性	17
一、在时代的召唤下诞生	17
二、在奋斗中赢得人民的信任	23
三、从掌握革命领导权到执掌全国政权	29
四、“错误选择”论的谬误	33
第三章 独特的政治优势	41
一、凝聚人心的光辉旗帜	41
二、千锤百炼的特殊风格	47
三、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	55
第四章 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62
一、社会主义建设应由谁领导？	62
二、四化大业的中流砥柱	68
三、安定团结的根本保证	76
四、改革开放的领航人	78
五、四十年伟大成就的见证	82

<b>第五章 建设民主政治的前提</b> .....	88
一、从一个关于民主的“悖论”谈起 .....	88
二、党开拓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民主化道路.....	96
三、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 .....	103
<b>第六章 公正、廉洁、文明的旗帜</b> .....	112
一、共产党人开创了一代新风 .....	112
二、惊叹号引起的反思 .....	118
三、让党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 .....	124
<b>第七章 从总结经验中走向成熟</b> .....	132
一、失误不是党的事业的主流.....	132
二、失误的产生同党的本质没有必然联系 .....	138
三、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开拓前进 .....	145
<b>第八章 改善党的领导</b> .....	153
一、为什么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	153
二、致力于党的领导职能的转变.....	158
三、改变党的领导方式 .....	162
四、维护党的领导 .....	168
<b>结束语</b> .....	174

# 第一章 绪论——严峻的挑战

##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4800多万党员、将近300万个基层组织的大党。中国平均每14个成年人中，就有一名共产党员。在当今世界上，在众多的共产党(工人党)中，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及其影响举世瞩目。作为一个有11亿多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党的状况如何，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总会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引起这样那样的反应。

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人们，同党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每一个青少年一踏上人生的旅程，他都不能回避如何认识党和怎样对待党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

党，这个用作称呼因一定的利害关系而结成的集团的字眼，过去有的文人是用揶揄或厌恶的笔墨去描写它的。大诗人屈原不是说过：“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党人”者，张仪、靳尚一类因私利而抱成团伙的小人也。屈原对这伙

人多么鄙视，多么反感！古人还留有训诫：“君子不党”。世世代代，人们都以不群不党为美德，见“党”就厌，谈“党”色变，避之唯恐不远。只有到了近代，到了共产党出现的时候，党这个字眼才唤起了人们美好的情感，“共产党人”这个词才因之灼灼生辉，正如郭沫若的诗句所云：“血性文章血写成，党人风格万年贞”。“君子不党”四个字再也讲不通了。你看，李大钊、徐特立、邹韬奋这些大学问家、大教育家、著名记者，不是一个个都“党”了吗？当时的趋向是群英结党，民心向党；正因为这样，所以党才能发展到以后的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联结，同每一个人的生活、工作、思想相联结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它因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靠长期英勇卓绝的奋斗，以及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特殊风格，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的支持、拥护。从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到全国革命胜利后，又将这样的领导权发展成为执政权。谁都知道，党从一个成立时只有50多人的蕞尔小党，发展为掌握全国政权的大党，这一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世界上，有的政党是靠议会中争取多数而取得国家政权的。中国不存在这种可能。孙中山就看到了这一点，而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从国内外的经验中得到启发，将自己拯救中华、改造社会的理想诉诸革命战争。它以领导人民革命的辉煌胜利向全中国表明，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有力量的、负责任的党。“选票”就是这样得来的。党通向执政舞台的道路是漫长的、艰巨的和曲折的，而一旦成为现实，亿万人民则以无



比欣喜的心情接受了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出自内心的拥戴之情。

如果说，党取得政权的道路是一曲赞歌的话，那么，凭借政权的舞台，难道不可以演出更加宏伟壮丽、光辉灿烂的史诗？人民是这样期待的，人民与党也充满信心。党的领导——难道会成为问题？难道还需要论证？需要“投票”？久而久之，尤其是随着党的事业的成功与不断发展，就很少看到或听到这样郑重的提问了。对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几十年来人们所担忧的是领导权被篡夺，而不在于党的执政地位本身。在许多人看来，只要提防党内出现林彪、“四人帮”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只要使党不被那些人夺去就可以了；至于由共产党领导中国，那是不会成为问题的，这种秩序是不会变动的。

然而，到了1989年的夏天，当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快满40周年之际，一场政治风波，捅出了许多极其尖锐的问题，以致在人们的心灵中引起了长久的震荡。

当时，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同国外反共反华势力相勾结，借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机会，打着反对贪污、惩治官倒腐败、拥护改革的幌子，成立非法组织，从煽动部分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到占领天安门广场，在北京地区制造了一场大规模的动乱，接着又把动乱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在关键的时刻，坚决顶住内外压力，采取果断措施，依靠人民解放军和工农群众的力量，才一举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这场风波是惊心动魄的，在许多方面及许多问题上使人警醒与震动。在共产党及其领导地位方面，动乱策划者集

中了自由化“精英”的许多思想，所提出的问题特别使人触目惊心。他们胡说什么：

——中国不存在成立共产党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是“舶来品”，是共产国际从苏俄贩来的。70年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是“历史错误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只是为一部分人“谋私利”的党，是“农民党”；共产党搞“农村包围城市”，是“农民文化”摧毁城市“精英文化”。

——共产党搞“一党专政”，搞“专制独裁”；中国应成立“反对党”，应把民主党派变成“准反对党”；中国要搞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轮流执政。

——“党领导革命可以，领导建设不行”；中国现代化建设应由政治“精英”主持，共产党不代表这样的“精英”。

——中国共产党“耽误了共和国40年的青春”；共产党已经腐败、变质；党的领导地位要“重新确认”。

——共产党的活动应限制在“党理党务”、“党筹党费”、“党正党风”、“党容党派”的范围之内。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事情很清楚，党遇到了挑战，党的执政地位遇到了挑战。党和党的领导地位并不是“不成问题”的，存在比想象更为现实。一时的平静，不等于不会掀起风波；把问题划为“禁区”，也不等于实际上没有非难、谩骂与攻击。动乱的策划者用血与火所推出的那个“党”字，已经不再是能够唤起美好情感的字眼。动乱，难道不是企图以非常手段改变党在现实中的形象与

地位吗？正如过去在反动派“围剿”时，党必须以战场上的胜利为自己的存在论证一样，在现实严峻的挑战面前，党也必须进行各种艰巨、复杂的斗争，以胜利为自己的存在论证。

## 二、党面临的考验

北京发生的动乱与反革命暴乱，说明国内反对势力的存在是无须否认的。顽固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公开诋毁、攻击共产党，反对党的领导，并把他们的思想与主张诉诸暴烈的行动。问题如此之尖锐与严重，不是偶然的。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的新问题，因一定政治气候的诱发而突然激化，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可乘之机。风波过后，我们不能不对党所处的环境、条件以及党的状况，进行一番认真的、客观的分析，以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找到目前党的观念为何会被淡薄，党的领导为何会受到削弱、受到攻击和损害的主要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居于核心领导的地位。邓小平说，这是“党的情况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掌权、执政，——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的意志，将党的纲领、路线、政策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法令，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必需步骤，是一件大好事。没有政权，无产阶级无从实现自己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崇高历史使命；而有了国家政权，凭着无

产阶级的博大胸襟、远大目光与拔山盖世的气概，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然而，掌权、执政对党却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这是因为，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虽然党的性质、宗旨和最终奋斗目标没有改变，但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较，党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是不同的，党进行自身建设的要求与特点也是不同的。过去，党在反动派的“围剿”中求生存，在白色恐怖下开展活动，入党、干革命必须时刻准备坐牢、牺牲；而执政之后，党到处受到颂扬，听到赞歌，入党往往被看作是一种荣誉，这难道不是天渊之别吗？一旦人们入党的动机不是出于无私的奉献，而是出于对荣誉或权欲的追求时，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便有可能受到污染。掌权执政，党同权力相连结，许多党员在各机关、各部门“当官”，担任领导工作，手中握有大权，这种状况也值得警惕。权力并不等于就是腐蚀剂，并不能腐蚀所有掌权的人，但一个意志薄弱者掌握了权力，他就很可能滥用权力，他很可能把“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可能把权力化为营私舞弊的利器！权力的滥用导致官僚主义的滋生与腐败现象的蔓延，最终可能导致掌权者本身的毁灭。所以，能否正确行使权力，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能否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政清廉，不谋私利，乐于奉献；能否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防止和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习气；总之一句话，能否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无疑是对掌权执政的党及其干部、党员的一个重大考验。

在掌权执政的情况下，不仅对坚持党的先进性是一个考

验，同时，党的建设也遇到许多新的问题。如果说，党在过去主要是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和分散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环境中进行自身建设的话；那么，解放以后党主要就是在由部分地区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的过程中，在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过程中，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转变的过程中，以及在由革命到建设的战略转变的过程中进行自身建设的。与战争年代相比较，党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艰巨。因为党的每一项方针、政策，对国家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从严治党，搞好党的思想、制度、纪律及作风各方面的建设，才能使党适应执政的要求，使党的决议、决策不至于出现大的偏差，不至于给国家、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党必须正确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党同政府、军队、群众团体及企业的关系，必须适应由破坏一个旧世界到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战略转变，学会领导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军事建设、文化科学教育建设、社会道德规范建设，等等。所有这些，也无一不意味着考验。谁说掌了权就可以松一口气，可以“坐享江山”呢？对于一个郑重的党来说，对于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来说，掌权就是承受各种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把自己置于“众矢之的”的位置上。“雄关漫道真如铁”！过得了掌权这一关吗？身为“党人”者，当好自为之。

除了面对执政的考验以外，中国共产党还面对着改革开放的考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把党

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三大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指明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方向。为了发展生产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这是在坚持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运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节机制，调整各类社会矛盾，改革僵化体制，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不断完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其严肃的历史任务。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走向进步和发达，中国的改革也不可能关起门来进行，而必须在开放条件下进行。因此，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振兴中华的唯一出路，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总方针和基本国策。改革开放对党所提出的新考验，是更为严峻的考验。

第一，能否卓有成效地领导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及思想观念的全面而深刻的伟大变革，很显然，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树立科学的态度，按客观规律办事，注重实践，走群众路线，才能把改革开放的大业搞好。任何浮躁作风，鲁莽行为，都不可能搞好改革开放，而决策的失误，还会把改革开放引上邪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全党必须重新学习，刻苦学

习。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必须努力从各个方面把自己锻炼和塑造成为具有开拓精神，远大目光，能完整理解和正确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人物。谁都知道，这种学习和这种风气的形成决不是轻而易举的。改革开放不仅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且促进人们的观念形态、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给人们的旧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带来巨大的冲击。这也给党的各级干部提出了能否驾驭全局，坚决而稳妥地领导好改革开放的大业；能否始终站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

第二，能否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应当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下进行。但不能不看到，由于中国的改革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的思路，有的人甚至会提出脱离国情的改革方针，可能把中国引向危险的前途。在变革旧的体制时，有人可能会错误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取得的成就，所实行的正确措施采取否定的态度；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人可能完全抹煞阶级斗争，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害性失去应有的警惕；在搞活经济的过程中，那些为发展现阶段社会经济所需要的，但与社会主义性质相矛盾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倾向，甚至要求摆脱四项基本原则；在对外开放以后，也会带来西方资本主义消极腐朽的思想影响，如此等等。这就说明，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可能会有所发展。如果对这一点缺乏清醒的认

识，改革开放的大业就会迷失正确的方向。对于为改革开放掌舵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第三，能否增强党自身拒腐防变的能力？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求党的活动方式、领导方式实行相应的转变。一些党性不纯，思想作风不纯的人，则可能在这个转变中发生权力与金钱相交易，用权力为自己谋物质利益的腐败行为。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从外部传来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在我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思想与生活方式的侵蚀还会有很大的能量。这就给党提出了能否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御和遏制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保持党在思想上、作风上的纯洁性的问题。

总而言之，为了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不能不实行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又给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严峻的考验。改革开放犹如一艘在怒海中行驶的大船，如果不能驾驭它，它可能与驾驭者同归于尽。这个考验，并不亚于战争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离不开国际环境，不能不受国际气候的影响。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出现转折性的变化，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党有可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然而，国际关系中客观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斗争。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过颠覆、消灭社会主义的战略，总



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他们妄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打一场以消灭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没有硝烟的”“不流血”的战争，以夺回资本主义的阵地。他们不断拨出巨款，利用国际广播、人权宣传、文化交流、国际会议和支援“民间组织”、“自由人士”等多种手段，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所谓“自由的种子”。在当前缓和的形势下，不同制度国家的交往增多。西方资产阶级趁机以更多的渠道、手段向社会主义进行渗透和施加影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赖其在经济、科技领域的优势，向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展开新的攻势。而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由于遇到困难和挫折，由于执政党在决策上有过许多严重的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于是，国际上便出现了一股所谓“社会主义走向失败，资本主义再现活力”的论调。对社会主义国家走上改革的道路，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退却”，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失败”，意味着他们的和平演变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他们特别起劲地以“人权”、“多党制”和“私有化”为口号，在社会主义国家鼓动资产阶级自由化，支持“不同政见者”。这种情形，反过来又对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复杂的影响，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一些漩涡或逆流。对中国，西方政要一再策划“充分利用中国开放政策所提供的机会之窗”，“促进中国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形成能与共产党竞争的其他权力中心”。他们就是这样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策动、扶植、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反对势